第一章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历史与文化

内容提要：本章依据现有史料和作者对自身生活环境的长期观察，介绍云南藏区的宗教文化、建筑艺术、口头文学、民间歌舞和传统工艺。这些文化要素既有与其他藏区相似之处，也有本地独有的特色。在藏区走向开放和市场化的过程中，本地文化受到强烈冲击，传统工艺逐渐失去市场。为此，作者建议政府采取措施，通过法律、投资和行政手段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

Abstract: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personal observation of his own living environment,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Tibetan region of Yunnan Province with its religious culture, architecture, oral literature, folk songs and dance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arts and crafts. Cultural elements of this region show both similarities and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as compared with other Tibetan areas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wards opening and marketization, the local culture has encountered severe shocks and, as a result,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re losing out. The author therefore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take measures to protect and develop traditional culture, including legal, financial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历史

1957 年 9 月 13 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由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三条大江拱峙的青藏高原极南端，三江并流腹心区域，一块藏族人民祖辈生息繁衍的宝地上成立了。

这块总面积仅有 23870 平方公里的地方，在地理位置上占据了古代藏区划分为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翼，下多康六岗之时下多康六岗中三个岗的南沿要塞，即崩波岗南端的中甸县、芒康岗南端的德钦县、察瓦岗南端的梅里雪山山脉东侧，德钦县云岭乡。

就在这一小块土地上，自古就有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等民族居住。大多数史学家认为，这一地带的民族来源于中国西北的氐羌。但考古、语言的证据都不足。这块广大的区域内发现了大量的旧、新石器文化遗存，从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经专家整理，其遗存的内涵、演进、交融、大体上都有了一些轮廓。整个文化遗存的分布是沿雅鲁藏布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沿岸形成的巨大弧形地带。最早的在 5 万年前，最近的约为两三千年前，这些地区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构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从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以来，这里的民族格局已基本定形。但行政区划的变动，都在不断地受着历史重大风云的影响而变动。这里汉时为越州牦牛地（又为神川、牦牛川）；唐代为吐蕃铁桥节度地；宋时为叶蕃东封地；元时为唐古忒地吐蕃游牧区；明时为丽江木氏土司地；清初为西藏属地（和硕特 1674 年进军中甸从木氏手中夺取，献与五世达赖为香火地）；雍正二年（1724 年）归版设治台，移剑川州判分驻中甸，遂属云南省辖。

二、以藏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

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最大的特点莫过于保留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俗。迪庆藏族千百年来经历了各种民族的统治，各种文化的冲击，然而，仍然牢牢地继承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雪域文化”。只要涉足迪庆，细心求索，就会体验到雪域文化的博大精深。它有极其牢固的传承性，其精髓体现在她那种“惟我独有”的物质观念之上。藏语中“物质”这个概念，是“生来具有变异性者”的意思，它把物质分为三类：①意识现象。②没有意识的触觉物体。③除了意识和意识的触觉物体之外的一切生来就具有变异性者。由此推论，藏民族由于“意识是物质，物质不等于意识的观念，因而不会产生物质与意识孰先孰后的问题。再如动物，“动物”这一概念在藏语中包含两层意思：①生命的意思。②留恋或爱的意思，是为“有情”者，由于这种观念也养成了从不轻易伤害任何生命的习惯。遵崇因果报应的哲理，藏族人民磨炼了吃苦耐劳、不屈不挠、容忍宽宏的性格。

在这人口仅有十余万的藏区，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艺术。德钦的弦子、中甸的锅庄、尼西的情舞、塔城热巴舞、寺院的宗教面具舞以及唱不完的山歌、情歌、劳动歌等等，种类繁多、精彩异常，使人们不得不赞叹这里是歌的海洋，这里的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更令人钦佩的是这里的艺人把《格萨尔》传播到毗邻地区的纳西族、傈僳族、摩梭人之中，成了这些民族民间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中甸金江傈僳族也将藏族“热巴舞”全套承袭下来，成为他们祖传的舞蹈艺术形式之一。

宗教文化是藏民族的精神支柱，与整个藏区一样，迪庆藏民早期信仰本波教，这里保留了藏民信仰的“白笨”，也保留着彝

族信奉之“毕摩”藏民称之为“黑笨”，纳西族信奉的“东巴”，藏民称之为“花笨”。如今，彝族之“毕摩”及中甸三坝白地发祥的“东巴”文化有其渊源可考。特别是现在“东巴文化”斐声全世界，而中甸县三坝乡白地村也就是“东巴圣地”，那里的天下奇观“白水台”和“阿明古洞”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纳西族有“没有到过白地不算真东巴，没有到过拉萨不算大喇嘛”的说法。

藏传佛教在这里也有相当长的历史，最早传入起码在 900 年前，现位于维西塔城乡其宗的“达摩祖师洞” 800 年前就有饶准玛在此修行过，宋代有“祖摩祖师”自印度至汉地东京，绕道云南寻找兹母亡灵，后在此坐化，上身化为火，下身化为水。位于祖师洞左右侧的来远寺、达摩寺（噶举寺院）建寺已有 500 余年。特别是在明代，由于木氏土司的支持，噶举教派在康南迅猛发展，在中甸境内建寺院大小达百余座，在木氏土司统治的纳西地区，有噶举 30 座，至今尚存。

这里的藏民每家都要精心布置一个佛堂，垒一天香台，早晚敬香祈祷。在过去也以能供养一个喇嘛为上，就是每家力争有一个儿子去当喇嘛，说这是比建一座金佛塔的功德还大。家里有丧葬大事，必定得请喇嘛念经超度，同时也请“仓巴”念经，卜卦、寺院在夏季要为民众念诵求雨经，防雹经。迄今，全迪庆州境内有藏传佛教寺院 24 座（含尼玛、噶举、格鲁教派）至于“日吹”圣地以及佛堂、敬香台、玛尼堆；神山、赞崩更是遍及各地，给迪庆藏族传统文化增添了神圣色彩。迪庆藏族人民除了生产劳动的繁忙，还天天不忘宗教生活。以此，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有个心灵的寄托，精神生活无疑也得到了充实。宗教还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塑造了藏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

三、迪庆藏族文化和保护与开发

民族文化有着广阔的外延和深刻的内涵，所谓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民族文化资源由民族物质文化资源和民族精神文化资源两大板块所构成。民族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潜力巨大，价值很高。但民族文化资源同样需要保护，没有保护会使其衰败、变性、灭绝。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一些民族文化好像已经或正在消失，一些民族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民族特色，失去了作为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一些珍贵的民族文物、民族古籍、民族风俗等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已经濒临消失。有些民族文化如不及时采取抢救保护措施，势必在一两年内有绝迹的危险。所以，民族文化资源不仅需要保护，对于一些濒临灭绝，不可再生的民族文化资源，更需要及早抢救，否则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一）民间文化

第一，中甸尼西情舞

人类追求自由、和谐、博爱的体现，尼西情舞。爱情是最有生命力的，情窦初开的青年人，最乐于交往，尼西情舞是迪庆独有的青年交谊舞蹈。其舞蹈奔放而充满激情，歌词充满对未来的憧憬，曲调优美而欢快。尼西，包括金沙江沿岸的“绒巴”地区，当青少年到一定的年龄，就可以参加这种交谊，甚至可以物色情人。尼西藏族青年的恋爱分三步：第一步为“同处朋友”阶段，就是小伙伴男男女女在一起玩耍，晚了，就由其中有权威的人安排，男女一起盖被睡觉，如同姊妹不发生暧昧关系。第二步，如果其中有人相互建立了感情，成为恋人，则不再与大伙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处睡觉，各行其便，称为恋人。恋人中，有终成眷属者，也有另择他人者。如果恋人之间未成眷属，他另择的配偶在正式结婚三年以内还得尊敬其昔日恋人，三年之后“收心”。第三步，终成一家人：成熟的青年在所有“同处”朋友中最终物色终身伴侣，建立婚姻家庭，算是正式步入了成人阶段。“尼西情舞”就是产生于这种独特社会文化氛围之中的舞蹈，与生活习俗息息相关。

如舞词中所唱“就像情舞词中所唱，命运如是安排多好”！尼西乡及绒巴地区的青年人，对爱情充满希望，希望命运像他们情舞唱词中所描述的一样，一切如愿。这是尼西乡特有爱情观，在常人不可思议之中，存在、活跃至今天。在中甸县音乐集成中，已收入了这一曲种，尼西情舞那充满激情、奔放热烈的舞姿，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被州歌舞团搬上舞台，现在，每逢重大节庆都能见到这一种舞蹈形式。

第二，中甸及德钦“锅庄舞”

“锅庄”，藏语音译名词，意为“圆圈舞蹈”，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歌舞，据学者论证，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锅庄舞又分为两大类，即“旧锅庄”和“新锅庄”。旧锅庄流传在中甸县大中甸、小中甸、格咱、东旺等地，其最大的特点是，在跳锅庄舞之时，一定要按照旧的舞步和唱词。有严格的规律，一般以三句为一段落。分六个大内容为一完整唱段，据说一共有 108 种唱法和跳法，跳舞的领导头者为“擦堪”，由擦堪领唱，众人跟着唱和跳。唱词一般是歌颂宇宙的形成、宗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歌颂神的福泽、英雄人物等。新锅庄除在跳法舞步上沿用锅庄舞步外，也有人新编内容和把弦子唱词置于锅庄之中，这些锅庄一般流传在德钦县奔子栏乡、维西县塔城乡的藏族和纳西族之中（维西塔城的纳西族，虽然说的是纳西语，但在跳锅庄时，亦用纯藏语唱词）。锅庄的特点是庄重、整齐、似乎还有点严肃，唱词复杂深奥。因此，在如今的年轻人中普及并不广，善于跳唱的多为成年

或老年人，目前除有个别曲种被人发掘修改后重新创作表演外，就完整的体系，恐不久便会消失。

第三，德钦“弦子舞”

弦子舞属“谐体民歌”，方言称之为“义”，因在跳舞时以二弦（马毛弦）胡伴奏，故名为弦子舞，弦子——马尾二胡，是一种短把二胡，木筒木柄竹弓、猪皮或马皮蒙面，声音纯厚。弦子舞多流传于德钦县境内，维西县塔城乡、巴迪乡、中甸县五境乡等地也有流传。这种舞蹈、老幼皆宜、青年人特别喜爱、其唱词多为六字一句。四句一段。唱词有歌颂群众欢聚，青年爱慕以及歌唱山水村庄等内容，活泼、奔放、流传面日趋宽广。唱词通俗易懂，曲调活泼流畅、朗朗上口。弦子舞有很多曲种和舞步，唱词内容也很丰富，能歌善舞的人，几天几夜都唱不完所掌握的内容，何况还可即兴创作，因此，如同滚雪球，越积越多。

第四，高吭、舒情的山歌“央”

“央”是一种高吭、舒情的山歌，唱“央”的时候，一般声调很高，一般嗓子欠佳的人是无法歌唱的。这种山歌、一般是独自一人，舒发情感时才唱、地点多选在山上，草原、水边，高声演唱，尤如呼唤，其声音尤如可达上苍。唱词一般八字为一句，两句为一首，如果远方有人应对，更加引人入胜。例如，唱山歌要在山顶唱，这歌声传到大海边，“唱山歌站在海边唱、这歌声传遍四大洲”。声音要拖得很长、而且要讲求婉转、悠扬。唱这种歌的人，多为出门在外的马帮伙子或在牧场的姑娘，很多用于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这种歌曲，在一种大的模式之下，根据歌唱者自己的嗓音和用词不同而变异为多种美妙的曲调。

第五，神秘的游戏—— 情卦

情卦在藏区流行面很广，是一种青年男女聚会游戏的一种方式，藏语称之为“谐莫”，意为“歌卦”，以唱歌的歌词含义，来卜算某位参与者的婚姻及命运。游戏方法是：参与者各自将一件

代表自己身份的东西、如首饰、戒指等，交与一人保管，保管者将各位参与者的物件藏好，然后任意取一件，让大家随意唱一段情卦歌，再由一位参与者解释唱词的含义后，保管者才亮出所藏物件，看是那一位参与者的，大家如果认为卦中所说与他的情况吻合，就说卜中了。例如，某一唱词中唱道：“骏马铃响叮，来到房屋之旁，因我胆量太小，没能将其留下”。歌词的解释是，参与者身旁曾来过一位可爱的人，但由于他的胆量太小，放过了与之交往的机会。意思是这位参与者曾失去过一次恋爱的机会。如果参与者真有此事，此卦就算卜中了。如此将每一位参与者以不同的唱词卜完，算是结束一轮。接着再进行第二次。情卦的唱词，基本是谐体格式，而且有不少与仓央嘉措情歌相仿，内容十分丰富、哲理性很强，但曲调比较简单、易唱。

第六，结缘的茶会歌

以茶会友，是茶马古道重镇中甸的一种交谊形式。每年夏秋，人们有到野外游乐野炊的习惯，特别是 5 月和 7 月的季节，中甸青年时常相互邀请“品茶”。如果某村男青年被另一村女青年邀应赴“茶会”，其实是被邀请去“赛歌”了。应邀前往的青年，从进入东道主村口开始就得唱赞美村落，田庄，道路的歌，进入主人大门开始就得唱赞美家园的歌，直到正式步入客厅、入坐、上茶，一切过程中，客人必须以唱歌的方法表示谢意和赞美，同时展示自己的才华，名为“茶会”实为歌会 —— 以歌会友，建立感情，这种“茶会”在中甸高原盛行。

第七，舒畅的劳动号子

在从事劳作的时候，以一种有节奏的歌声伴随，使繁重的劳动显得轻松愉快，这是高原藏民的又一杰作。藏民们在伐木时，有伐木的号子，在筑墙时，有筑墙的歌。在打奶子时，有打奶歌，还有，收割薅锄、架青稞、赶马、放羊、扬场等等都可唱出不同的曲目，达到减轻繁重的劳动负荷，创造优雅劳动环境的目

的，尤如他们并非在吃苦劳作而是在嬉戏玩耍，其乐融融。

第八,英雄史诗《格萨尔》

《格萨尔》是流传在藏蒙等民族中的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据不完全统计，有 300 万诗行、3000 万字。流传在迪庆的《格萨尔》，又被纳入“曲光”的范畴、至今仍流传很广，1984 年普查时，迪庆发现六位艺人，其中有两位受到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科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表彰。然而，艺人多为老年，大多相继去世，流传的曲艺，也逐步蜕化为故事梗概传说。

第九，喜庆时的赞词

藏族人民无论在结婚、乔迁、节日等喜庆的嘉宴上，都会请一位有学识有口才的人进行一番演讲，致一通称为“赞词”说唱。有叙述天地形成、人类起源以及宗教伊始的《列占》；有结婚时专门讲述地方历史家族史，介绍新婚者父母祖辈乃至称赞新婚夫妇德行的“帮列”；有专门用于新建房屋落成典礼上演讲的“穹对”；有在专门场合演唱的赞扬英雄兵器的“郭谐”；有在节日喜庆时演唱以表达祈祷万事吉祥的“哲给谐”等等。这些演讲，注重哲理性、逻辑性讲求词藻的华丽，又必须有历史、宗教、伦理知识性，对与会者起到启迪和教育的作用，委婉道来。在演唱之时，端坐在首席上演讲的，也有手持道具、边舞边吟唱的，为节庆增添欢乐气氛。

上述歌舞曲艺，除个别有些地域局限外，均属全州境内普及的民间艺术，在目前的新形势下，为一展本地人文景观，大多数地区都在积极发掘和表演。但是，由于急于体现其外在形式，很少按其门类加以严格传承，出现了一个舞蹈，明明是“热巴舞”，却以锅庄曲子作为伴奏，或者一个节目，把锅庄、弦子、山歌的曲调揉在一起，久而久之，产生变异，失去原来门类的特点，派生出五花八门的表演和演唱形式。因此，目前应注重原始资料的收集和保存，如能写成书和制成录音、录像资料更佳。这样，即

使在藏族文艺起了翻天地覆的发展之后，人们还可以看到原始的歌舞曲艺，也可作为作家创作时的参考范本。

（二）民间工艺

迪庆由于交通闭塞，与外交往不便，这里的人们，从生活、生产方式上，形成了“小而全”的特点。这里的人，为自给自足，从生产门类和生活方式上，达到基本不靠外援的格局，除了茶叶须从汉地运进，其余各种生活必需品，都能自己生产。于是，在解决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创造了各种工艺制作和文化艺术。无论如何封闭，这里因处于三省交汇之处，茶马古道必往之地，又是多民族共同生息和开发的地域，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弥补，某种工艺、由某个民族擅长、某种文化源自某个宗教。形成了多元互补、丰富多彩的沉淀地带。

第一，中甸尼西乡塘堆黑陶文化

塘堆村，在距中甸县城 30 公里的塘堆自然村。塘堆，意为草坝上方的村子，与该村相对的塘满村即草坝下方的村子。是个处于高原与峡谷过渡带的村落，海拔 3000 米左右。全村共 32 户（包括哈拉在内），760 人，主要从事农业耕作，其中有 20 户人家继承了中甸藏民必须生活用具黑陶器皿生产传统，生产黑陶大多数是业余进行，专业从事黑陶制作且工艺水平相当出色的是被称作“杂堪”（黑陶专家）的孙诺七林。

第二，中甸尼西乡岗觉村木家具、器皿彩绘艺术

岗觉村，位于中甸县城北部 60 公里的香格里拉大峡谷下部谷口，汉名“上桥头”。是古代茶马古道必经之路。 1935 年，红军长征北上也路过此地，因此，在此建有一座铁索桥叫“红军桥”。该村地处于热河谷地带，年降雨量不足 300 毫米，全村 30 户，167 人。仅有土地 39 亩，平均每人 0.23 亩。四周皆荒山悬崖，植被除仙人掌刺丛外，无乔木生长，四边地角种有少量果树，一条大河“岗赤”从村边流过，注入金沙江。因为田地太

少，这里的人自古从事生意和手工业——木制器皿、家具的制作油漆和彩绘。据调查岗觉村从事木家具、器皿、彩绘制作迄今已有三四代人（近百年）。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经建立一木碗厂，现已破产。仅有三户人家仍操木碗制作和木器绘画职业。这三户漆匠主要的特点是继承了土漆、涂料和金铂、银铂绘图的工艺，可是由于土漆制作原料珍贵，制作工艺复杂因此价格比较昂贵。由于其他地方的工匠大多数人采用了现代油漆绘制家用器皿，造价大大低于土漆绘制的器皿，而且产量大。在目前和前几年人们的消费意识中普遍存在追求便宜的倾向，因此销路比较广，使这种造价高、质量好的精品显得过分昂贵，很难销售，因此，三户漆工的生意都不太好，加上基础薄弱、财力有限，这几户传统工艺面临断炊的危险。

第三，藏族原始造纸工艺

在藏区，过去使用的纸大多为藏纸，据段绶滋《民国中甸县志》载，中甸有一自然村，名纸坊塘，专门造藏纸，以供应松赞林寺僧人书写经文。藏纸系土法制造，原料采用草筋树皮和小狼毒草根捣碎成浆制做。因有小狼毒成分，藏纸不会被虫蛀，而且经文写于其上风吹雨淋也难腐蚀，反复翻阅不易破碎。

与藏纸相仿，中甸北地纳西族中现仍有此工艺，目前由东巴文化山庄的几位老东巴自造这种纸，用以书写东巴文和绘画，但规模不大，产量不高，销售渠道也不甚通畅。

第四，皮革制品

专业做皮革加工的，历史上皆为丽江纳西族属河人氏，他们用牛皮制革，以鸡屎淹泡，竹火熏制成的鞋底皮，经磨耐用，据说，有皮匠木阿八、为霞给念哇（一位旧时土豪）制作一双皮鞋、霞给念哇穿此鞋走印度一趟回来还没磨烂，可见皮革的牢实程度。纳西皮匠制作牛皮鞋，也揉制羊皮，缝制皮衣，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中甸有一皮革厂，是当时地方轻工工业之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现因现代市场的冲击而倒闭。在民间，尚有少数工匠（业余性质），能揉制兽皮，以做衣裤之用，也有缝制为雪地专用的“雀郎”皮鞋。他们揉制的獐子皮，如同棉布柔软，而且非常耐穿。所谓“雀郎”皮鞋，鞋底为生皮，鞋帮为毛布缝成，在雪地中行走，雪水不能透入，鞋子缝得很宽大，里面塞满一名叫“余古”的枯草，很温暖。

第五，原始猎具

迪庆藏民历来以畜牧业为主，历史上很少有专业猎户。但是，千百年来生产生活、战争、预防野兽等所需，在民众中遗留了不少种猎具和武器。特别是以兄弟民族中善于狩猎的傈僳族、苗族、彝族取长补短，现已有多种猎具和防身武器的制作方法。例如，弓箭、弩、扣、笼等。

第六，麻制品

麻布制品是普遍使用于中甸三坝纳西族地区和小中甸藏区的一种生活必需品，除麻绳、麻线等以外，最突出的是他们过去普遍穿自制的麻布衣服，他们种植麻，然后撕下麻皮用灰水煮制然后纺成麻线，再用手工织成布。麻布质地柔软、牢实，一般不染色呈白色，间夹些许红线，缝出衣服美观大方。如今，由于大量化纤和棉制品的输入，三坝乡纳西族穿麻布衣服的人从 20 世纪 50 年代 80％减至 5％左右，小中甸的藏民从 50 年代的 50％锐减至 1％。麻布的制作工艺，趋向于消失。

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上述工艺已逐步失去市场，根据迪庆资源，也无法大批量生产。但是，作为一种古老文化的象征，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以土产旅游商品及工艺品的形式推出，也不无市场，如丽江东巴文字写在土纸上，很受游客青睐，又如猎具，可在旅游景点设立模拟打猎或射箭射弩比赛等，也可让游客买回去作为纪念。总之，应从保护民族民间工艺的角度，大力提倡，其中一些产品有可能成为如同其他民族“蜡染”刺绣之类

的商品大有可开发的市场。

（三）藏传佛教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原则

迪庆州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遗产的宝地，这里沉淀着以雪域文化为主的多元性文化遗产，而藏传佛教寺院以其独特的方式，成为藏传佛教文化的载体，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反映在其建筑风格、宗教仪规诸方面，也以其独特的精神方式，渗透于藏族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在迪庆被誉为“香格里拉”的今天，如何保护和开发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将“香格里拉”的人文景观开发而为丰富和活跃成州支柱产业旅游市场服务，将成为迪庆州经济建设重大课题之一。中甸噶丹松赞林及所属大宝寺、德钦东竹林及附属书松尼姑庵，维西塔城达摩祖师洞均属宗教活动重要场所，是宗教职业人员敬业修身之地，也是民众满足宗教生活之所，其所处地区，应首先顾及寺院和僧人的利益和权利，保证僧人的正常宗教生活及修行，同时考虑所在区域民众的扶贫和增加经济收入问题。寺院景观已成为“香格里拉”旅游的重要人文景观组成部分。旅游部门在此的投资及回收，将带动僧人及群众的经济收益。因此，三者必须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共同保护和开发这一产业，处理好利益分配的问题。做到寺院有正常的清规戒律，景点不受任何损害，农民有相应的服务收入，旅游部门有此项目的投入和应有的收入，达到社会安定，旅游活跃，各得其所。民族宗教行政部门有责任协调三者关系，加强管理，帮助争取资金项目。

（王晓松执笔）

第二章　创建财政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模式

内容提要：本章对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财政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从中发现迪庆州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两个严重的脱节现象：①经济增长和财政增长基本上是脱节的。②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增长与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的相互脱节。在这样一种财政体制下，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长的不稳定性就会相应出现，特别在外来因素的冲击下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财政支出增长不再依赖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增长缺乏兴趣，其结果是追求财政支出的最大化。在地方政府追求支出最大化的同时，并非一定注重财政支出结构合理化。经常出现的现象是大部分财政支出用于与经济增长无关的行政事业费上，以及财政支出上的无效性和浪费。迪庆州内部的财政分配体制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县级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为松散。越是财政收入低的县得到的上级财政补贴越多。对于迪庆州的三个县来说，无激励效应却是值得重视的。因此，对于迪庆来说，重要的不是要不要给予财政补助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补助的问题，也就是说怎样找到一套有效的补助机制，使得上级财政补助既有助于解决地方财政支出上的困难，同时又不会对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产生负激励效应。政府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大力发展私有、个体和其他各种经济成分，从而形成稳定的、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来源。同时政府应该努力改变现行的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行政事

业费支出，使得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基础建设和教育卫生事业方面。

Abstract: The report investigates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fiscal revenues/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iqing, the Tibetan region of Yunnan Province. There are two findings. The first is that the growth of fiscal resources has been divorced from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egion. The second is the separation of wage increases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from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households. As a large proport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in Diqing comes from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provinci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the growth of its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has shown great volatilit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is becomes more apparent when the region is shocked by "exogenous forces", such as changes in redistribution policy of the provinci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A heavy fiscal subsidy leads to local governments in Diqing to maximize fiscal expenditure rather than fostering growth of fiscal revenues. Moreover, governments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fiscal spending. Constant, rapid increase in spending on administration, inefficient allocat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s and waste of public projects are often observed. Within the region, an egalitarian distribution of fiscal resources is witnessed between counties. Either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among revenue collected and expenditure at the county level, or the relationship is actually negative. Nevertheless,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the central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s should continue fiscal support for Diqing, since it would fall in a vicious circle without that support. The question is how to find an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mechanism which provides fiscal assistance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out generating disincentive ef-

fect on fiscal and economic growth. Finally, this report suggest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Diqing should place the provis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as their policy priority, encourage the growth of private sector in order to foster a stable stream of fiscal revenues, and make a great effort to cut down expenditure on administr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财政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从理论上讲，财政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既可能存在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即一方面财政增长促进和调节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财政增长的持续来源。然而，也应该看到它们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关系，即财政的增长停滞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后者反过来影响前者的增长。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以上两种发展类型都不乏相关的案例。对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而言，上述哪一种发展类型可能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面临的宏观大环境和整个经济的财政体制。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往往依靠中央财政的帮助，不然则难打破所面对的恶性循环；一个相对发达的地区也可能自身难以营造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如果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体制割断了该地区财政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发展中国家内部一个落后地区的财政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进行深入的考察是非常有意义的。基于上述考虑，本章在对迪庆州财政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财政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试图从中发现一种能够适合于该州特点的财政增长和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

二、迪庆地方财政特点及其相关的假说

相关资料表明，1999年迪庆州的人均GDP是2455元，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37.6%，相当于云南省人均水平的55.1%[①] 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上述两个比例是不断下降的，因为在1985年时迪庆州的人均GDP相当于全国水平的56.3%，相当于云南省水平的98.6%。迪庆州的相对落后不仅仅表现在人均GDP水平上。它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经济地区[②]，较低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00）》，1999年迪庆州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070元，相当于云南省平均水平的74.4%；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8.4%[③]。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迪庆州，人均财政收入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表2—1给出了1985～1999年迪庆州财政收入总额。从中我们可以算出，1985年的人均财政收入仅为38元，1997年为192元，即历史上的最高点，但它仅相当于当年云南省人均财政收入的52.3%；相当于全国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的53.6%。1999年的人均财政收入降低到150元，分别相当于云南省和全国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的36.2%和33.8%。从表2—1中还可以看出，扣除物价影响之后，1997年的实际人均财政收入只比1985年增加了35.3%，而1999年的实际人均财政收入仅仅比1985年增长3.7%。

迪庆州经济发展不仅是落后的，而且由于具有云南省惟一的

①作者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00）》和《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的数字计算的。

② 1997年全州的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仅为12.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7个百分点。

③作者根据《云南统计年鉴（2000）》和《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的数字计算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